

贵州历史文献资料丛书

贵州历史文化名人

第一集

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



贵州历史文化名人

贵州历史文化名人

■ 一 ■

贵州历史文化名人

贵州历史文化名人

黔新出(93)图内字第021号

贵州历史文化名人

梁 燕 老 志
竹 琴 苍 友
姚 伊 九 六 元

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

前 言

贵州自明永乐11年（1413）建省以来的580年间，由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一带的工农商学兵陆续迁入屯居，和早先入黔以及原住的各民族一起，共同从事开发和建设的工作，因而逐渐出现繁荣兴旺的景象，各民族独具特色的优秀文化艺术，也逐渐传播出省，以至于光耀世界。贵州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忠肝义胆、博学宏才的人物，他们的光辉事迹，受到人民的崇拜和景仰，从而也宣扬了贵州，改变了一些人视贵州为蛮荒之地的观念。

明末诗人、画家杨龙友，名噪江南，在反抗异族统治的活动中，也有凜然可风的表现。何腾蛟以南天一柱的英雄气概，一度挽救了南明的危亡。周渔璜以天授其才的诗人气质，在清康熙时名满京华。郑珍在清代道光、咸同之际，以经学、方志鸣世，《巢经巢诗》有“清诗三百载，王气在夜郎”的盛誉。莫友芝以版本、目录、声韵、书法、诗文的独特成就，与郑珍并称为西南巨儒。丁宝桢任山东巡抚，四川总督，因兴修水利而功垂后世；杀慈禧太后宠监安得海，真可谓铁中铮铮人中佼佼。黎庶昌是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个文化名人。李端棻在京引荐康有为、梁启超与清光绪帝见面，促成了戊戌变法前奏曲“公车上书”的壮举。姚茫父在民国年间以其横溢的才华，独步于北京艺坛。黄齐生是平民出身，自学成才的社会教育家。谢六逸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。

还有更多的人物，他们的名字为贵州的知名度增添了光彩。

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打算先以“贵州历史文化名人”为题，陆续收集资料，用传略体分别编写专册，让这样的一套人物传略，供作教育青少年的资料，也供作一般人认识贵州的参考。在特定的社会情况和历史时期，必然会出现一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；而人物在历史演变过程中，是反映社会变革较为生动活泼也较为真实可信的史料。一部廿四史，最多的篇幅都用来写人物传，最能引人入胜，更有可读性的文章，也是人物传。但人物资料的收集和筛选是有一定困难的。近些年学术界提倡健在的人，要抓紧写些自传、回忆录，留下一些日记。这是无可估价的一笔文化财富，应当引起重视。省内虽然也有人用各种形式编写出版的一些人物传略问世，毕竟还没有把它系统化起来，这也是应当引起关注的事。

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考虑到许多文化名人的资料收集不够全面，在编写本书时，就不必强分人物活动时代的先后和传文字数的多少；既是资料性的传略体，也不必强求写作风格的统一。第一辑出版后，还将安排二辑三辑以至多辑的问世。希望会员同志和读者对这种多辑本的《贵州历史文化名人》传略的编写，提出宝贵的意见，使这样的一本书在历史文献研究工作中和社会教育各个方面，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应。

1993年5月

贵州历史文化名人第一集

目 录

诗画名天下 忠骨埋青山

——诗人画家爱国者杨龙友

史 继 忠

南天一柱

——南明政权的重要支撑者何腾蛟

文 长 康

清初杰出诗人周渔璜

翁 家 烈

“西南巨儒”郑珍

黄 万 机

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莫友芝

杨 祖 恺

一代名臣丁宝桢

史 继 忠

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黎庶昌

陈 福 桐

推动维新变法 提倡新学教育

——变法维新的重要人物李端棻

侯 绍 庄

文学艺术家姚华

邓 见 宽

民主战士社会教育家黄齐生

谢 孝 思

新文化运动的战士 新闻教育的开创者

——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谢六逸

秋 阳

诗画名天下 忠骨埋青山

——诗人画家爱国者杨龙友

史 继 忠

“白骨青灰长艾萧，桃花扇底送南朝。不因重做兴亡梦，儿女浓情何处消。”《桃花扇》是一出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名剧，它借明末“复社”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“离合之情”，写出了南明一代“兴亡之感”，是清代戏曲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南明覆亡、清朝建立之后，人们痛定思痛，要求从南明的痛史中吸取教训，于是，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应运而生，其中，最负盛名的就是洪升的《长生殿》和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，一时被誉为文坛双壁，致有“南洪北孔”之说。

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，山东曲阜人，孔子的六十四代孙。他生于南明王朝倾覆后的第三年，在时代的影响和家庭的薰陶下，深感亡国之痛，沥心沥血地写成了《扇花桃》一剧，“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，亦可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之一救矣”。《桃花扇小识》说：“《桃花扇》何奇乎？其不奇而奇者，扇面之桃花也。桃花者，美人之血痕也。血痕者，守贞待字，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。……帝基不存，权奸安在？惟美人之血痕，扇面之桃花，啧啧在口，历历在目，此则事之不奇而奇，不必传而可传者也。”

《桃花扇》这幕历史悲剧，以弘光王朝的覆灭为背景，

以侯公子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开，处处紧扣着一把扇子。这把扇子，是侯、李定情的信物。当侯方域被迫出走之后，抚臣田仰强逼李香君为妻，香君拒而不从，一头撞在地上，鲜血飞溅到扇面上。杨龙友看了血扇，深表同情，便在血滴之间添上枝叶，画成一枝折断的桃花，由此产生了桃花扇的故事。

在《桃花扇》中，杨龙友并不是戏中的主角，而是以“间色”的姿态出现，成为连接故事情节发展的“针线”。尽管孔尚任在《桃花扇》第一出《先声》中，一再强调，此剧是“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”，但它毕竟是文艺作品，不是历史著作，由于剧情发展的需要，不得不塑造一个“两面三刀”的杨龙友。杨龙友之所以被歪曲，主要原因是他出入于“复社”而又是马士英的姻亲、阮大铖的盟弟，平时好交游，推奖士类，而一般阿谀奉承的小人便钻了这个空子，通过杨龙友而巴结马、阮，以此遭人诋毁，致使杨龙友蒙上不白之冤。于是，舞台上的杨龙友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杨龙友面目全非，两个杨龙友的人格迥然不同，堂堂的君子被错作无耻小人。剧中的杨龙友，仿佛是一个八面玲珑、虚情假意的花花公子，他能书善画，风流自赏，出入于花柳之间，既与复社文人侯方域、秦淮名妓李香君素有往来，又与马士英、阮大铖等互相勾结，当马、阮得势时做了官，设下收买侯方域的圈套，以致迫使侯、李分离，造成悲剧，第七出《郢旌》集中地表现了这种人品。

然而，历史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杨龙友根本不是这样的小人，而是大义凛然的明末抗清一杰，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画家，在画方面他是“画中九友”之一，在诗方面他被列入了

“崇祯八大家”。被颠倒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，还原杨龙友的真面目。事实上，企图为阮大铖拉拢侯方域的并不是杨龙友，而是一个贪图利禄的什么“王将军”，这一点，在侯方域所写的《李姬传》中说得非常明白。可是，孔尚任在写《桃花扇》的时候，为了减少头绪，使人物性格更加典型，满足艺术上的真实，有意无意地把拆散侯、李的罪过全部强加在杨龙友身上，于是，舞台上的杨龙友，便以“奸诈小人”的面孔出现在观众眼前。对于这一点，梁启超是很不满意的，他在《桃花扇的批注》中写道：“《桃花扇》颇借奖杨龙友，然不录其死节，而弃官潜逃，不可解！”。

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，为了“以古鉴今”，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，又出现了一个“桃花扇热”，其代表作为欧阳予倩的同名京剧《桃花扇》，以后又创作了谷斯范的小说《新桃花扇》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作者从为政治斗争服务这一愿望出发，故意添盐加醋，虚构情节，牵强附会地肆意抹黑，极不公正地把杨龙友硬推入反面人物的行列，大加渲染，给人造成一个很坏的印象。在左倾错误思潮甚嚣尘上的日子里，史与戏完全被混为一谈，竟然把杨龙友说成是“由风流浪子逐渐变为势利小人，由帮闲逐渐变为帮闲而兼帮凶”。杨龙友已被诬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作为贵州人已是忍无可忍，今天我们在为杨龙友作传的时候，应当摒除舞台给人们造成的偏见，公允持平，为杨龙友鸣不平，昭雪沉冤，再现爱国者兼诗人、画家的杨龙友。

杨龙友实为抗清一杰

杨龙友，名文骢，号山子，明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

诞生于贵阳城南郊石林精舍。龙友少负不羁之才，长于文事，娴于骑射，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。自幼癖嗜山水，十二岁即“朝登日观暮谒月”。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年）举于乡，与贵阳望族马氏之女结秦晋之好，是为马士英的妹丈。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，水西土目安邦彦举兵反明，围攻贵阳达百日之久，“飞鸟不通，城中死伤过半”，龙友随父杨师孔参与守城，次年围解，龙友提兵追击，小有战功。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阖家随父移居南京，住在白鹭洲桂香居，时年二十八岁。在金陵，名噪一时，天下已知其为文士。其人豪侠自喜，意气轩翔，跌宕潇洒，坦荡而无城府。好交游，“与当世结交为伉俪，挥金如粪土，气豪才壮”，常以诗酒书画相邀，推奖士类，乐于助人，颇得东南名士推重。时值明末党争未息，马士英、阮大铖之辈勾结阉党余孽，把持朝政，卖官鬻爵，结党营私，人民恨之入骨，南京城内民谣四起，讥讽马士英“养马成群”。当是时，一般稍有气节的人，对马、阮极端不满，他们继承了东林党人的遗风，激扬文字，指责时弊，抨击阉党，揭露宦官脸嘴，结成“复社”以相抗衡，深得民心。杨龙友虽与马士英有至亲关系，又是阮大铖的盟弟，但在公理是非面前，他却公然站在文士一边，成为复社中的活跃人物。然因其与马、阮有些干系，贪求功名者又常通过龙友以为引见，以此代人受过，不免遭人诋毁。

其实，杨龙友乃是豪杰侠义之人，素有报国济世之志，在国难当头之时，一刻也不忘为国立功，请缨上阵，战死沙场，正是：“书生亦有长缨在，虏血应教淬剑环”。在《送马瑶草还白门》的诗中，他满怀激情地写道：“天下正多事，举目悲胡尘。如何谢安石，踟躅空江滨。新命闻自天，

挥手起苍生。”在《壬申秋陈木叔简以长歌》中，他写道：

“民力苦已摧，求征尚未歇。与子愿偕行，无衣歌岂曰”，忧国忧民之情洋溢篇外。明季之世。女真兴于关外，努尔哈赤建立“大金”以后，累犯边关，造成严重灾难，时值孙承宗任辽东经略使，奋起抵抗，立下不朽功勋，但却遭到把持朝政的宦官攻击排挤，罢官回京。杨龙友对这位爱国将领十分敬重，登门拜访，承宗感慨不已，特赠以“在边克敌所制人头杯”，为此，杨龙友慷慨悲歌，写下了《孙大将军赠我以人头杯长歌赋谢》一诗。诗的开头，以豪壮沉雄的笔调，展现了北方疆场战火纷飞的宏伟气势，“天骄溅血污青天，十年虏尘迷九边。家家空有生铜吼，豪客谁驱走锋颠。绿眼将军勤远战，腰控金钩赤羽箭。紫骝一骑踏黄沙，夺得敌儿驾飞电。何必嫖姚与吴起，雄略行边几万里。渴餐冷血当清泉，旋起头颅作杯子。”点出“人头杯”的主题后，紧接着讴歌“我亦拔剑目裂眦，宝气八斗惊白帝。壮怀长啸向君开，恍如独鹤空中唳”的英雄气概。诗的最后，情不自禁地写道：“君不见，孙阳有眼夸绝尘，又不见，孙武行兵驱妇人。君臣朋友自千古，谁能再见孙将军！”字字有情，掷地有声，“矢报国”、“起苍生”，扣人心弦，感人肺腑。

然而，在坎坷的仕途上，杨龙友总是怀才不遇，壮志未酬，他六次进京会试，结果都是名落孙山，年愈三十而功业未成，正是：“三十三年电光走，二十四番风又吹。功业有人驱热焰，诗书传我拔寒灰。”在南京十余年间，杨龙友报国无门，只好寄情于山水诗画，遍历江南名胜，“遇佳山水，赋咏图画，充韧行囊”，写下了大量诗文，汇集而成《山水移》。

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，杨龙友三十八岁，在六次落第之后被谒选，委为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教谕，开始步入仕途。在华亭，“与其弟子明经史，习诗书，纵览古今之故，高谈帝王之略”。四十三岁升迁浙江青田知县，关心民瘼，兴利除弊，训练兵民以保障地方，闲暇则与诸生谈论诗文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改任福建永嘉知县，“用兵海上，荡平群寇”。然事有大谬不然，上任不到一年，因营救复社文士而得罪阮大铖，御史詹兆恒借故弹劾龙友贪污，竟被夺官候审，闲居家中，以书画自娱，这便是《桃花扇》第二出《传歌》中所说的“罢职县令”。

事未了结，而北京城为李自成所破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，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自立，建立弘光王朝，起用杨龙友为兵部职方司主事，历员外郎、郎中，监军京口。杨龙友颇知兵事，观长江形胜，以为金山踞于大江之中，地控南北，为兵家必争之地，于是奏请在金山筑城以资防御，借以阻止清兵南侵。不久，龙友升迁兵备副使，分巡常州、镇江二府，监大将军郑鸿达军。是时清兵大举入关，长驱南下，扬州陷落，史可法就义，人民惨遭杀戮，造成骇人听闻的“扬州十日”。及至清兵临江，杨龙友驻扎金山，扼大江以守。五月，龙友擢右金都御史，兼督沿海诸军，仍驻京口，与清军隔江对峙。清军以竹木编成大筏，置灯火于筏上，夜半放之中流，大举来攻，龙友令部下以炮轰击，清军一败涂地。五月初九日，清军再次南犯，乘迷雾潜渡偷袭，迫岸而明军方才知，仓皇列阵于甘露寺，遂为清军所败。十五日清军破南京城，福王逃奔芜湖被俘，朝中大臣纷纷迎降，弘光政权就此覆亡。

南京失陷之后，龙友退守苏州，“自誓必死，与屯兵长白荡的将领吴易约为声援，“出入旁近州县”，四出游击。清军派遣明朝降臣鸿胪寺卿黄家鼐前往苏州劝降，龙友拒而不受，乃派兵袭杀黄家鼐，退守处州。在处州广募兵丁，“练士卒，屯险隘，屡梗东南一隅”。八月，郑芝龙、黄道周等拥唐王朱隶键在福建称帝，建元隆武。唐王早年与杨龙友交厚，大将军郑鸿达又极力保荐，乃以龙友为兵部侍郎兼右金都御史，提督军务，不久又升任闽浙总督，准备收复南京。隆武二年（1646年）六月，衢州告急，隆武帝令龙友提军驰援。七月，清军蜂拥而至，几路进攻福建，郑芝龙不战而退，吴易又兵败被俘，龙友独木难支，被迫退守蒲城。杨龙友与福建兵备副使孙临合兵一处，欲取仙霞关以为据点，但关隘已先被清军所占，经过一番激烈战斗，龙友、孙临寡不敌众，身负重伤，被清军追骑所获。清军主帅贝勒博洛多再三劝降，杨、孙二人宁死不屈，于八月二十五日壮烈殉国，时年五十岁。龙友全家妻妾、子女及仆从三十六口，一同赴难。浦城人民慕其气节，为之举哀，将其忠骨掩埋于大树之下。嗣后，孙临的侄子奔往浦城，寻其尸骸，举行火葬，以衾枕裹负至安徽桐城，葬于城东三十里的枫香岭。人称“双忠墓”。“国存犹尽瘁，事去独成仁”，杨龙友铁骨铮铮，以身许国，不失为抗清一杰，事见《明史、杨文骢传》。

“画中九友”之一的杨龙友

杨龙友“少负奇才，文章剑术，兼擅其能，尤耽书画，伸纸泼墨，如风驰雨骤，生趣横溢”。尽管杨龙友长于兵

事，但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他并不是驰骋沙场的燕赵之士，而是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，他善书法，工诗文，尤精于画，时人谓之“诗书画三绝”。正是因为他的诗名、书名、画名大过于他的功名，诗、书、画反而掩盖了他的政绩，致使为国死难一节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，而在民间则多流传着他的诗画轶事，寥寥数笔勾画出来的桃花扇，竟成千古一绝。

杨龙友的画，三百多年来一直受人称道，“虽片楮尺幅，人争宝之”。执明末画坛牛耳的董其昌，曾在《山水移引》中写道：“画家以神品为宗极，又有以逸品加于神品之上者，曰失于自然而后神也，此诚笃论。恐护短者窜入其中，士大夫当穷工极妍，师友造化，能为摩诘而后为王洽之泼墨，能为营丘而后为二米之云山，乃足关画师之口而供赏音之目耳。杨龙友生于贵筑，独破天荒，所作台岩等图，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结，有元人之风韵去其佻，余讶以为出入巨然、惠崇之间，观止矣！龙友一日千里，春秋甚富，未见其止。”在明末画坛上，杨龙友与董其昌、王时敏等人并驾齐驱，合称“金陵九子”。明末清初，周亮工作《读画录》，甚赞杨龙友“工画、善用墨”，复举诸家对杨龙友书画的赞誉加以评述，谓其画“意欲一洗时习”，“下笔如风舒云卷”，“笔带烟雨，萧疏而远”，“皆以苍秀出入古法”，最后以“眺听之美，皴染之工，书法之妙，眼中顿有三绝”来作概括。清初吴伟业作《画中九友歌》，歌云：“阿龙北固持戈矛，披图赤壁思刘曹。酒酣洒墨横江楼，蒜山落月空悠悠”。自此以后，杨龙友被列入“画中九友”。

杨龙友出身于书香人家，父亲杨师孔颇有文才，“生平工诗文，好游览，善擘窠书，交游甚广”，著有《秀野堂

集》和《远游漫记》，擅长真、行大书。龙友自幼生活在文学气息浓厚的家庭环境之中，受着诗情画意的熏陶，童年时代即留心绘事，“笔走云烟，思通造化”，十五岁作《兰竹卷》，二十岁作《赠无功山水卷》，在画坛上初露头角。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移居南京，所作《仿九龙山人山水图》立轴一幅，意境高远，画技精湛，此画后来流落海外，保存在日本出版的《支那名画大观》第五集中，是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杨龙友墨迹之一。杨龙友到南京后，眼界大为开拓，又常与江南名士交往，画艺大有长进，这一时期的代表作，现仍可见到的有《十竹斋书画谱、石谱》中的几幅，所画石头，刚劲而神奇，“突兀影欲动，磋砑势亦颠”。现存上海博物馆的《兰竹图》，或恐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，图中有两丛春兰生长于石头之间，“冷光生艳，缭绕霏微”，给人以清秀、静穆的美感。在南京十余年间，杨龙友拜董其昌（玄宰）为师，悉心学画，深明画理，大有“一日千里”之势，正如他在《投赠董思白先生》一诗中所说：“万里扫门依绛帐，可能为渡出迷津”。有一件《万历三才诗画》册，杨龙友画，董其昌题，陈继儒跋，画极精美，所画吴中山水，“望之时爽气”，《小龙湫图》有“独秀”、“卓笔”两峰，巉岩突兀，云遮雾罩，“看白衣飞度与水光相荡，山色送晴，树影若失，恍不知其在人世矣”。秦懋德在《山水移跋》中说：“余偶以诗画自娱，谬荷海内诸公许可，每论此中三昧，必推龙友与华亭董宗伯并驱中原，眼前诸子，鲜见其匹也。”故黎庶昌《拙尊园丛稿》说：“余虽无鉴古识，然视其品骨，萧淡简远，似当在太痴、云林之间，文、董不逮也。”近人俞剑华《中国绘画史》称，明代千余画家，能独

立于临摹风气之外者，惟杨龙友等数十辈，实开扬州画派之先河。今日本所藏杨龙友《山水图册》、《山水图卷》、《秋林远岫图》、《林泉清集图册》、《兰石图》，以及国内珍藏的数十幅图画，如《仿董巨山水》、《行书七言律诗扇面》、《仙人村坞图》、《深谷鸣秋图》、《落霞孤鹜图》、《云间竹居小墨山水轴》、《墨兰竹卷》等等，大体可见杨龙友书画的精微。《深谷鸣秋图》是杨龙友于崇祯戊寅（崇祯十一年，即1638年）秋八月中秋前三日所画，刊于正中书局影印本《中国名画》第八集，画上有杨龙友自题“曲水小桥红叶乱，遥闻深谷有吟秋”的诗句。画的左上方有武进黄山寿诗，画的左下方有蒲华所题“画意苍茫当暇日，想应戎马未援衢”等句，画的右下方为宣统元年二月上浣吴郡陆恢审定并记，记云：“杨抚军山水流传绝少，而画品高隽，出下润甫上，故吴梅村（吴伟业）《九友歌》中极推崇文”。

杨龙友对画理颇有真知灼见，特别重视“用笔”与“用墨”两端，他的主张比较集中地表现在《与董玄宰先生论笔墨二首》诗中。用笔之法，独具匠心，强调主观印象的神韵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提笔须认我，无令笔有权。自然笔还笔，此际识真诠。迂者岂其迂，颠耶谁能颠？先天一笔起，妙在不可传。”在他看来，作画应当以意写形，按照自己的感受画出独特的意境和风格，不必拘泥于一笔一画，信手画去，宛若天成，妙在不言之中，这就是所谓“下笔如风舒云展”，“笔带烟雨，风疏而远”。龙友“善用墨”，用墨之安，全在画家用水得当，他说：“惜墨不在墨，要在先惜水。苦心不问手，对境岂谋纸。看君泼墨时，浓淡皆有理。毫端嘘董巨，砚池活范李。滴滴生气飞，尺幅几千里。”这